

中国近代爱国人物故事丛书

主编：张海鹏 徐辉琪

文化教育名流



● 宫玉松 李洪岩 ● 福建教育出版社

中国近代爱国人物故事丛书

张海鹏 徐辉琪 主编

文化教育名流

官玉松 李洪岩

福建教育出版社

编者的话

在我们的祖国不断改革开放、追赶世界前进步伐的今天，青少年朋友，你们知道，曾有多少爱国志士、民族英才为此奋斗过吗？

1840年，西方侵略者的枪炮轰开了封建中国紧闭的大门，灾难深重的中国近代史也从此开始。从那时起，许许多多的爱国者开始认识到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为了寻求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道路，他们不畏艰难险阻，甚至不惜献出热血和生命，留下了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也留下沉重的历史教训。

在这套丛书里，我们要告诉青少年朋友的，就是这许许多多民族英才追求、奋斗的故事。他们中有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魏源；有主持变法图强的康有为；有民主斗士；有民族工商赤子；更有为民族的解放与进步而奋斗不息的共产党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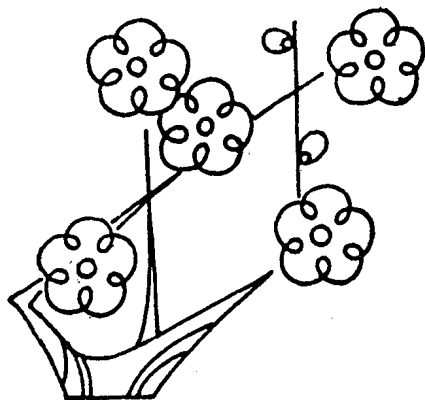
这套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专家张海鹏、徐辉琪主编。丛书中收录了中国近代一百多位爱国人物的故事，分成14个分册出版，每册介绍一个领域或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代表人物。无论在编排上，还是内容表述上，它都与已出版的各种爱国人物传记有所不同，不仅具有历史的真实性，还具有故事的生动性。内容丰富，情节曲折，文笔流畅，

亲切感人，特别适宜青少年朋友阅读。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增进青少年朋友对近代中国的了解，增强民族自信心，认识中国的过去，珍惜今天，为祖国的未来而奋发向上。

1992年12月

目 录



出版元老张元济·····	(1)
人世楷模蔡元培·····	(27)
报业大王史量才·····	(47)
教育巨子陶行知·····	(58)
风云人物胡适·····	(80)
一代奇人梁漱溟·····	(108)
平教大师宴阳初·····	(124)

出版元老张元济

1949年9月6日，一列由上海开往北京的旅客列车在华北大地上奔驰。车厢内，茅以升、赵朴初、盛丕华等社会名流谈笑风生，兴奋不已。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位慈祥友善的83岁老人，被尊称为菊老。他就是近代著名的出版元老张元济。

张元济是应中共中央邀请，由儿子张树年陪同，赴京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在京两日，来拜访他的各界名人络绎不绝，其中茅盾、郑振铎、胡愈之、叶圣陶、周建人等人，都是他早已熟悉的商务印书馆老部下。9月11日傍晚，张元济没有想到周恩来副主席亲自登门前来拜访，心情格外激动。两人畅谈了大约半个小时，周恩来在临行时还特别叮嘱张树年要陪同老父亲出席大会，并说他会通知秘书处准备好入场证件。13日傍晚，周恩来又同中共领导人林伯渠一起，设宴招待各界代表。晚宴共设六席，张元济被邀请坐在第一席首座上，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9月19日下午二时半，爱说爱笑的陈毅来了，他对张元济说：“菊老，毛泽东主席请你一起游天坛”。张元济一行

来到天坛，见毛泽东早已在祈年门外面等候多时了，两人握手，互致问候，然后一起参观古代文物。参观间歇，大家围坐品茗。张元济坐在毛泽东身边，两人谈起戊戌政变时的情况，毛泽东向他详细询问了光绪皇帝召见他时的仪式和当年在北京当官的情形，谈得格外开心。毛泽东还称赞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刊有益于民众，说他本人就从商务出的《汉译科学大纲》中得到不少新的知识。入夜，张元济在床上辗转反侧，不能入眠。他对儿子说：“我这辈子没见过太平盛世，中国的外患内战一直不停。我见过光绪，见过袁世凯，见过孙中山，见过蒋介石。光绪想把国家治理好，但是人太懦弱，结果变法失败了，后来死得不明不白。袁世凯是个枭雄，阴险毒辣。蒋介石竟是一个大流氓。今天看到了毛主席，我觉得毛主席有学问、有胆略，周恩来对人是那样体贴入微，看来中国有望了。”

生不逢时 跻身仕途倡变法

提起中国近代以来的出版业，人们总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而一提起商务印书馆，人们又会马上把它同张元济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张元济的一生，是整个近代中国文化出版事业的缩影。

1867年，张元济出生在广东。祖籍浙江省海盐。他的字筱斋，号菊生。祖上是海盐的望族，曾经建过一处园子，以藏书、刻书著称，也就是有名的“涉园”。张元济童年是在粤东度过的，直到14岁时，母亲才带他回到原籍老家，见到

了涉园旧址。可是，经过历年兵灾战乱，涉园的林泉台榭早已被毁，只剩下若干巨大笔直的参天大树还在凭吊着往日的书墨余香。

不久，他的父亲去世了，家里生活变得拮据起来，不得已辞退了佣人。张元济因此养成勤俭、节约、务实、苦干的性格。他苦心忍志，问学读书，希望在科举的路上取得成功，换取一官半职。他18岁成为秀才，接着又中举人，中进士。与封建时代的大部分读书人相比，张元济真是够顺利够幸运的了。中了进士，也就肯定能当官了。他被选到有些像封建官僚储存库的翰林院，然后被实际授予一项六品的刑部主事官职，再后来他到主要是办理外交事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做了一位章京（即协助处理案牍的官员）。

在封建衙门里做事，张元济感到非常痛苦。甲午中日战争，中国被日本打败，先进的中国人从睡梦中醒来，可封建衙门里却依旧醉生梦死，故态依然。有一天，他到总理衙门事务厅（即收发处）去，发现公文堆里有一封电报，签名的是俄皇尼古拉第二。电报是给光绪的。他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不由公使转呢？照例这样的电报应该立刻送给光绪的，但他一看已经在事务厅里搁了两天，就报告总帮办瑞良。瑞良骑马赶来，恐慌万分。即请同文馆学生来翻译后送进去。可见当时政治的腐败。当时在总理衙门当章京的，只有张元济一个人略识洋文。衙门里还有一个木橱，摆着和外国所订的条约，这样重要的文件竟不注意保存，任何人都可以看。他万分感慨：这种腐败的国家岂有不亡之理？

1896年前后，张元济等数十位在京官员，常常在京城名

胜陶然亭聚会，议论朝政。他们当中有文廷式、黄绍箕、陈炽、汪大燮、徐世昌、沈曾植、沈曾桐等人。后来，康有为到北京，组织了保国会，参加的人更多了。由于当时张元济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担任章京职务，光绪喜欢看新书，常常写条子到总理衙门要书，便都由张元济经手办理。黄遵宪《日本国志》，光绪指名要看，也是他送上去的。

在参加政治活动中，他感到：“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从此开始向西方寻求救国的真理。他认为当务之急，“总以鼓动人心为第一义”，“其次即为培植人材”。一再敦促他的知己朋友汪康年开办学堂。他意在创办报纸、开设书局，用以启发民智。开办学堂，目的在于培养“贯通中西，兼知他项西学”的人材。他说：“今日自强之道，自以兴学为先。科举不改，转移难望。吾辈不操尺寸，惟有以身先之，逢人说法，能醒悟一人，即能救一人”。“吾辈今日做事，但求有益于人，一己之身名，可勿爱惜”。为此，他和陈昭常、张荫棠、何藻翔、曾习经、周汝经、夏偕复等人发动各省督抚募捐了好几千元钱，并在北京宣武门内租到一座大房子，合力创办了一所教授西学的通艺学堂，教授英语和数学，他自己也在其中学习英语。同时，开始和严复交往。通艺学堂的校名，即严复所题。严复还在学校为学生“考订功课，讲明学术”，阐述“西学门径功用”，很受欢迎。对于汪康年、梁启超在上海倡办的《时务报》，他也给予热情支持，并在北京代为分发。

戊戌子遗 回天无成被革职

张元济有一枚图章，内刻“戊戌党锢子遗”六字，是专为纪念戊戌变法而制的。1898年戊戌年，光绪皇帝宣布实行变法，命令大臣们推荐变法人才。当时有位叫徐致靖的侍读学士，给光绪上了一封密摺，保荐康有为、张元济等人，并认为张元济“熟于法治，留心学校，办事切实，劳苦不辞”，是个能够筹划新政的人才。光绪看到这个秘密报告，便下令康有为和张元济到颐和园来见他。

戊戌年4月28日，光绪召见康有为和张元济。天没有亮，他俩就到西苑，坐在朝房里等候。太监传他进去，在勤政殿旁边一个小屋子里召见，光绪坐在上面，张忙跪下。光绪语气极为温和对他说：“我们中国道路不通，一切落后，什么事都赶不上外国，怎么好和人家办交涉呢”。张说：“皇上现在励精图治，力求改革，总希望国家能够一天比一天进步”。光绪听了之后叹口气说：“可是好多人都不赞成呀”。张元济心里觉得皇帝也够可怜了，又见皇上面貌殊欠刚健，发现御座后窗外似有人影，也不敢再说什么，话头便转到了通艺学堂上。三刻钟后，召见完毕，他退出来，隐隐感到有些压抑。

皇上召见后，张元济并没有陷入盲目的狂热与乐观中。在冷静的观察中，理智告诉他：“所谓新者，亦不过一纸诏书而已”，实际上“举动毫无步骤，绝非善象”。他同往常一样，按时到总理衙门值班，到通艺学堂学英文，读新书新

报。然而，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促使他不能单纯冷眼旁观。于是他连续给光绪皇帝打了几份报告，请求允许满汉通婚，剪发辫，除拜跪。他主张在用人问题上破除情面，裁汰冗老，拔擢真才，发挥专长，反对蒙头盖面，滥竽充数，这对推行新政来说，有着头等重要的意义。他还对诏定国是以来廷臣的因循守旧、欺罔蒙蔽，以及刘坤一、谭锺麟的复奏迟延，怀塔布等的阻塞言路，提出了抨击，接着列举了推行新政的纲领条陈和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共列总纲5条1细目40条。他看到鸦片战争以来“政教之不修，举数百万里之沃壤，任人割割，莫敢谁何，悉惟其便”，仅仅90年而形成“日蹙之势”。他怀疑自今以往，其仅存之版图，是否能永无残阙，恐尚在不可必之数。故切望凡我同胞，均应“忧勤惕励，而谋所以保兹疆土之策”。他当时的情形，正像他后来在一首诗中所说的：“不安卑位竞言高，妄欲回天气自豪”。

然而，形势却朝着他担心的方向发展着。戊戌年6、7月间，守旧党反对新政的空气已很浓厚。张元济就劝康有为适可而止，不可操之过急，并劝他趁机会出京回籍，韬晦一时，免撻众忌，到南方去开办学堂，造就一批新型人才，将来风气大开，新进盈廷，人才蔚起，自然水到渠成。但康有为没有听从。8月初，外面风声更紧了。初六日，张元济等人到东交民巷日本大使馆去见伊藤博文。伊藤话中有话地对他们说：“一个国家要变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定要经过许多挫折才会成功。诸位有志爱国，望善自保重”。他的弦外音，张元济没有多加考虑。但当他由日本使馆出来，就听到了西太后自颐和园回宫、政变发生的消息，才知道日本

人早就得到了西太后要搞政变的情报。

谭嗣同等人被杀后，维新党人捕捉殆尽。此时谣言纷纭，都说清廷要抓张元济，有人劝他赶紧出逃。他考虑到老母亲还在自己身边，怎能单身逃跑呢？但又担心一旦缒骑到门，不免使老母亲受惊，于是依旧每天到衙门值班，早到晚退，使清廷知道他在署中，“可以就近缚送，不必到家查抄”。不久，对他的处分决定下来了：革职永不叙用。他把处分决定呈给母亲看，老母亲对他说：“儿啊，有子万事足，无官一身轻”，言毕抚慰再三。张元济不觉捧着母亲的手，泪如雨下。

张元济将通艺学堂关闭了，把校产造册交京师大学堂。李鸿章派人来安慰他，问他今后如何打算，他说想到上海去。李鸿章特意写信把他推荐给在上海的盛宣怀，这样，他便到了南洋公学。

昌明教育 支持译书有其功

1898年初秋，张元济来到上海，负责南洋公学（即交通大学前身）译书院的工作。从此，他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终其一生，出书、校书、写书、藏书，孜孜不倦，乐而忘返。他自称“我是书丛老蠹鱼”，“书城坐拥乐未央”，而他之所以愿做一位“书城蠹鱼”，在他的一首诗中有鲜明表达：“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

人们常说，近代中国有两大翻译家，一位是严复，一位是林纾。然而林纾并不懂外文，只能借助别人的口译来转

述。真正懂外文，并且通过翻译对中国近代思想界发生革命性影响的，则是严复。而一旦提起严复的译著，人们又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张元济。

张元济和严复本来就有着比较深厚的友谊。张元济办通艺学堂时，就曾得到过严复的支持。张元济被撤职，离京南下途经天津，严复曾亲自到码头送别。现在，张元济办理译书院，首先想到的便是向这位熟谙译书之道的老朋友讨教，希望严复给出些主意，想些好的选题，还说他准备先出版严复翻译的英国人宓克著《支那教案论》。两人鱼雁传鸿，书信不断。不久，译书院便出版了严译亚当·斯密的《原富》一书，该书“所驳斥者多中吾国自古以来言利理财家之病痛”，大大开拓了人们的眼界。以后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严译的其他7本名著，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人。这其中，都凝聚着张元济的贡献。

严复译书，自称“字字由戡子称出”、“一名之立，旬日踟蹰”，所以，他要的稿费也很高。当时一般译稿大约每千字二元。严译《原富》15万字，南洋公学却支付给他二千元，另给印数百分之二十的版税。尔后张元济出他的书，都按百分之四十付版税。在当时，除张元济之外，找不出第二个出版商肯付给译书人这么高的稿费，严复也从没有在其他地方拿过如此高的版税。这不仅反映出他具有一种开阔、长远的目光；同时，张元济还为近代出版业的版税制树立了先例和典范。

1901年初，张元济接任南洋公学总理。这正是义和团运动刚刚被镇压下去的时候，张元济已看透清政府根本就救不

了国，曾经大着胆子劝李鸿章不要再为清廷效力。李鸿章却对他说：“你们小孩子懂得什么呀？”在公学里，他不仅勉励学生们读新书，而且还请具有新思想的蔡元培等人来学校任教。他集合同志创办《外交报》，专门向国人介绍外国的情况。不过，那时南洋公学里有个叫福开森美国人，趾高气扬，处处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张元济很看不惯，便提出辞职。这样，他又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

投身商务 硕果累累有其因

1902年，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从此，在60年的出版生涯中，他成为商务印书馆的灵魂与人格代表，先后担任编译所所长（1903年至1918年9月）、经理（1915年12月至1920年）、监理（1920年至1926年7月）、董事长（1926年8月至1959年8日逝世），为中国的文化出版及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商务印书馆于1897年创办于上海，创办人夏瑞芳是张元济的朋友，两人意气相合，互相倾服，合作达十余年之久。夏对张言听计从，肝胆相照，两人相处非常愉快。本来，张元济依旧有许多升官发财的机会，正像他所说的：“若欲得钱，则取不义之财孰有如做官之便者？”那么，他为什么要到当时还规模甚小的商务来呢？就是为了教育。他曾与夏瑞芳约定：“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得到夏瑞芳同意。教育什么人呢？他说：“无良无贱，无智无愚，无长无少，无城无乡，无不在教育之列”。即进行普通教育，目的在

于“取泰西种种学术以与吾国之民质、俗尚、宗教、政体相为调剂，扫腐儒之陈说而振新吾国民之精神。”

这样看来，张元济的志向真是特别宏远。与康有为等人所不同的是，他是一个埋头苦干的实干家。他认为，“世界万物所以维持于不敝者，赖其本身有新陈代谢之能”，所以变法维新是顺乎社会发展规律的事情。不过，不是随便什么人就能够变法、能够维新的，“必有至诚惻怛之意，而后可以言变法；必有卓立不移之概，而后可以言维新”，这又必须有教育为前导。没有教育，也就没有人才，任你口号喊得震天响，结果只能是“原作牺牲想，空将血肉埋”。所以，张元济不主张标榜什么“西学”、“新学”之类空名号，免得去刺激顽固派的神经，而主张去做些实际的事情，以便水到渠成，顽固派想反对也无力回天。这是他从戊戌变法失败中总结出的经验教训，也是他投身于出版事业的深刻思想根源。

目标已定，接下来便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论起学校课本，在张元济主持下，商务印书馆聘请社会名流编写、出版了数不清的大、中、小学教科书，遍布大江南北。论起报纸杂志，人们会想到商务出版的《东方杂志》，它是中国近代寿命最长的刊物。说到工具书，读书人都知道有部《辞源》。至于翻译外国书刊，历史学家都免不了要提起商务出版的《林译小说丛书》、《世界丛书》、《俄罗斯文学丛书》等。但最令后人惊叹钦佩的，还是由张元济主持的几部大型古籍丛书，例如《四部丛刊》，共3编，收书近2万卷；《续古逸丛书》，影印宋刻孤本40多种；《百衲本二十

四史》3301卷，820册，被誉为“全史中最标准的本子”；《丛书集成》则“集古今丛书之大成”。以上四大丛书都是有大学问的人做的大工程，详细介绍起来足以写一部大书。令人肃然起敬的是，张元济本人，上至编辑这类大型古籍，下至编写小学启蒙课本，全都同样认真，一丝不苟。从时间上看，他编的书纵贯古今；从空间上看，他编的书横跨中外；从学科上看，他编的书跨越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总之一句话，书，成了他生命的有机组合。据统计，截止到解放前，商务出版的图书，总数在15000种以上。这在近代中国出版史上是空前的。张元济被誉为是“开辟草莱”的人。

环游世界 悲愤苍生历凶险

为考察国外小学教育普及情况，特别是盲聋哑教育、贫儿教育和初级职业教育情况，张元济在1910年做了一次环游地球旅行。他自上海启程，经香港、新加坡，在十个半月的时间中，先后游历了英国、比利时、荷兰、德国、奥地利、匈牙利、瑞士、意大利、法国、美国、日本等十多个国家。

轮船经过厦门时，他发现上来1700多位衣衫褴褛、脸色黑黄的中国人，都自称是赴新加坡与槟榔屿做小买卖或当工人的。但他们身无长物，目光呆滞，根本就不像是小商人或技术工人。张元济感到很疑惑，就向同船的旅客打探，才知道这些中国人全是被贩卖的奴隶。船将启锚时，他又看见有个英国领事带领外国医生及捕头登上船来，逐一检视那些中

国奴隶，看看他们身上是否带来病毒。检视中拳打脚踢，大声吆喝，“几不以人类相待”，却不见有中国官员出现。张元济见此情形，非常愤懑，他在游记中写到：“何吾中华堂堂自主之国，而船舶入口检疫者率为白人？虽白人亦吾政府所雇，而外人之入境者，见关医无一华人，则以为吾中国之人皆不知医，其视我岂不与野蛮相若？事之可耻，孰有甚于此者耶？国于今日，必不能与世界大势相违”。

同船旅客还告诉他，每年二月份是贩卖奴隶最繁盛的时节，大船可载数千人，小船也可载数百人，生还者只有十分之二三，中国官员从不过问。这些被叫作猪仔的奴隶，在海外垦荒开矿，工作之苦殆难言状，“呼吁无门，隐忍受命，其辗转而死于沟壑者不知凡几矣”。张元济闻此言，内心更加悲痛，很想解救这些同胞却又毫无办法。

船到埃及，他上岸到英国人开办的邮局去寄信，发现所用邮票全是埃及的，不禁想到中国各租界的外国邮局无不使用其本国邮票，简直是把中国看得还不如埃及，心中的悲愤更加强了。

回国后，他对腐败的清政府进行抨击，并且积极参加了反对帝国主义掠夺我国铁路权的斗争。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后，他通知商务印书馆各部门，除掉英语和汉语读物外，其他一切在编、在排、在印书稿全部停止进行。紧接着，他要求编辑们立即收集材料，编写出版广东、湖北、四川三省革命纪与革命党小传，与清政府实行彻底决裂。

然而在这之后的几年里，商务印书馆却出现了危机。原来，商务印书馆有位叫陆费逵（伯鸿）的大能人，突然有一